

是幸福快乐的源泉，民族繁荣的基础。文章这样写道：

知识是幸福和快乐的源泉，它是驱除一个国家无知迷雾的亮光，它能博得荣誉，它可增进民族的财富，而且归根到底，它是一个国家最强有力的国防。民族繁荣的永久性基础，可以安放在它的上面。

从学生的作文看，基督教对学生的影响也很深。有人在文章中说：

我认为是基督教的创始人，不是牧师本人在圣经中清楚地告诉人们，这个世界将走向基督教化，将从黑暗走向光明。基督教教义的影响正在通过传教士广泛传播。牧师也是由基督教创始人任命的，这个创始人在宗教各个领域都有相同的权威。^①

有的文章也赞扬来华传教士，说他们不顾重重困难，从地球的一端来到另一端，为了“挽救许多无知者”，为了向人们传播“上帝的真正福音”。可见，基督教思想潜移默化地对学生思想进行渗透。如一位学生写了一篇歌颂劳动，题为《劳动》的作业里，他一面说“劳动应被认为是人生中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另一面又说“这是造物主所设计”的。可见，基督教对于学生的影响无处不在。

七、新型的学堂 杰出的学生

马礼逊学堂的出现，标志着西学教育在中国的兴起。该学堂的教师较为系统地教授西方近代知识，使学生获得从旧学堂里无法学到的新知识。马礼逊学堂虽属草创时期，在办学方面也不能说已十分完善，但以后的西式学堂却以此为基础，随着学堂逐步增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科目，学堂便逐渐成为传播西方文化的主要阵地。同时，这些学堂的教育形式、教育方法又冲击着中国

^①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4, p. 501.

封建传统教育制度。无论是教会学校还是教方人士涉身非教会学校，他们都力图按照他们的需要来培养、塑造人才，正如时人所比喻的，这是“鬼谷先生”与孔门争夺地盘。在这些学堂里，推行西方学制，以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方法来组织教学，从内容到方法都与中国的传统教育不同。所以，这些学堂“对于弊端丛生的中国传统教育体制来说，确实具有破旧立新的启蒙意义。”^①它既刺激着中国传统教育方式和内容的更新，又逐渐影响中国官学的改造以及新式私立学校的兴起，中国女学的兴起更是受其启迪。

马礼逊学堂的创立，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作用，对中国教育产生过直接的影响。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该学校的影响。从对旧教育的冲击而言，有学者认为：传教士办学形式客观上起着冲击当时中国旧教育体制的作用，对促进中国旧教育体制向近代化方向转化有潜移默化的功效。^②从该校毕业出来的学生，他们走上社会，服务社会，对近代中国的进步都有积极的表现，从这方面看，马礼逊学堂的教育是成功的。正如人们所说，鲍留云“在建立和管理学校方面相当成功，而他通过一群学生——他们成为许多行业的杰出人物——对于中国未来的影响可能不逊于任何一个传教士。”^③马礼逊学堂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以及西学东渐的作用的确不能小视，有学者指出，它“是近代中国本土第一个以新教传教团体为背景、以普通教育为内容的学校，标志着近代教会教育史的开端。它将西式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引进中国，同时又在学校中保留了传统的教学法，进行了长达10年的实践。这既是对其他类似学校经验的借鉴，也对后来的教会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④

马礼逊学堂虽然只是对学生施以小学、中学程度的教育，但是，在这个学堂出来的学生，比如容闳、黄宽、黄胜和唐廷枢四人都有非凡的表现。

（一）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

容闳（字达萌，号纯甫）蜚声中外，同时代的美国友人称赞他是个极有

① 董丛林：《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45页。

② 仇华飞：《早期中美关系研究（1784—1844）》，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

③ [美]卫斐列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第57页。

④ 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第352—353页。

才干的人，他“有强烈的爱国心”，“除了要完成他自认为对其人民有利的工作外，并无任何个人野心。”孙中山说容闳“才智学识，达练过人”。^①后人从他倡导留学教育，主持幼童赴美留学评价他，说他是“中国留学生之父”。有人从他的经历、他的为人评价他，说他是实干家、活动家，“做的”要比“想的”和“提倡的”多得多。^②

容闳是在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他出生在离涉外口岸澳门不远的广东香山县南屏村，在封建封闭的社会里，中国东南沿海的人比内地的人要多一点对外经商意识，容闳的父亲是个地道的农民，却愿意送儿子到洋学堂学习，与这种文化背景不无关系。1847年容闳随校长鲍留云赴美，在孟松中学毕业后考进耶鲁大学。当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仍然学习中国文学，他曾写信给澳门的卫三畏，请求寄些中文书本给他在美国自修。而今在耶鲁大学图书馆藏有不少容闳的手稿，包括他曾作过的一些诗，其中有：“善似青松恶似花，如今眼前不及他，有朝有日霜雪下，自见青松不见花。”该诗写于1854年5月11日，正是大学毕业时。



容闳

1854年在耶鲁大学毕业后，容闳放弃可以谋取高职的大好机会，决定回到阔别多年的故土，报效祖国。当他回到家，跪在母亲膝下，告诉母亲他毕业于美国人引以为荣的耶鲁大学，获毕业文凭时，母亲不知文凭有何效用，反问他文凭能值多少钱？容闳没有直接回答。他只告诉母亲，他是第一个中国留美学生毕业于耶鲁大学，母亲便是“第一个中国留学生毕业于美国第一等大学者之母”。母亲虽然面有笑容，但看着面前西装革履、留着胡子的儿子，总有点不自在。她让儿子脱去西服，去掉胡子，穿上长袍。母子的对话，反映了东西文化观的歧异。

在一个外受欺凌，内存忧患的多灾多难的国

①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4页。

② 张海林：《王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

家里，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要报效祖国，绝非易事。他曾任美国传教士伯驾的私人秘书，原以为可以通过伯驾接触清朝官员，实现其教育计划，谁知伯驾对此不感兴趣，给他的每月工资只有15元，容闳干了几个月就辞职了。随后，他到了香港，在香港高等审判厅任译员，工资较高，每月可得75金。但他不想当翻译，想学习法律，做开业律师，由于受英国律师的排斥，只好放弃此计划。不久，他到了上海，进入上海海关，在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的安排下，在翻译处工作，薪水优厚，月薪75两白银。容闳工作了3个月，看不惯外国人掌管中国海关，便向李泰国挑战。他问李，“以予在海关中奉职，将来希望若何？亦能升至总税务司之地位乎？”李泰国趾高气扬地对他说：“凡中国人为翻译者，无论何人，绝不能有此希望。”容闳一气之下，辞职不干，在辞职书上，容闳铿锵有力地质问：“中国人为中国国家服务，奈何独不能与彼英国人享同等之权利，而终不可以为总税务司耶？”李以月薪200两加以挽留，也留不住他。容闳解释辞退的原因是，“今海关中通事及其余司一职者，几无一不受贿赂。以予独处此浊流中，决不能实行予志，此辞职之本意也。”^①经过几番蹉跎，后来，容闳通过赴美购置机器获得了清朝洋务派大员的信任，在曾国藩、丁日昌等人的帮助下，心中蕴藏了十几年之久的教育计划，终于得到了清政府批准，并于1872年带领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赴美。这既是他的心愿，也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大事，容闳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当之无愧。

容闳的思想，改良主义和激进主义兼而有之，在早期活动中，前者占主导。他主张和平改造中国，为此，他多次向清朝大吏上书，提出他的改造中国的最新方案，突出的是他以西方银行为模式建议建立中国近代银行的计划。容闳和留美学生黄开甲一道翻译美国的《国家银行法》、《美国改订法及附录》等文，在这基础上，制定国家银行方案，并在张荫桓和翁同龢帮助下，上奏朝廷。容闳的银行计划包括《银行总纲四条》、《总行章程十二条》、《分行章程二十四条》和《续拟银行条程六条》等，其开办银行总构思集中在《银行总纲四条》，包括开办事权、印发钞票、扩充公行和兼管铸造。^②他的计划很快得到清廷批准。正当容闳满怀信心地为实现计划进行筹备之时，由于时任中国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35—36页。

② 容闳的国家银行计划分别发表在《时务报》第9、10册。

电报局总办兼上海招商局总办的盛宣怀反对和阻挠，计划终于搁浅。

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已是70岁老人的容闳，积极参与了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派活动的策划。西太后发动政变后，他企图营救梁启超出京，失败。他也因此成为被通缉捉拿的对象，仓促亡命上海租界，后又避难于香港。随着和平改造中国计划的不断碰壁，容闳思想中的激进因素不断增强。1900年，他支持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自立军活动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由和平改良走向武装革命的开始，也是容闳思想变化的转折点。7月，以容闳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上海召开自立国会，通过容闳起草的宣言，并选容闳为会长，具体负责外交事务。但起义不幸归于流产，容闳在中国境内振兴中国的努力也宣告结束。

对辛亥革命的支持是容闳爱国心的充分体现。当武昌起义胜利时，这位83岁高龄、身在美国的老人，听到自己曾为之努力过的事业终于有了结果，兴奋不已。1911年12月，他在一封致友人函中表达自己对辛亥革命的看法和心愿：

目前在中华帝国发生的政治现象在历史上确是非凡而空前的。

在仅仅数月的剧变中，我们古老的中国，从中部震及四方，直至几乎所有省份都举义参与我们反对满清王朝及政府的斗争。

我真诚地希望不会发生任何事来敌对目前遍及全国的平和的情绪。如果领导者的个人野心产生并占据了他们的心，将加重混乱、无政府和流血，不可避免地一定导致外国的干涉。这将导致整个中国被瓜分。

愿所有中国的爱国者警惕这种危险，防止这种情况出现。

如果健康状况允许，你将发现我很快会回国，纵然不能去同敌人战斗，也可以提点对公众利益有益的建议。^①

容闳比孙中山大38岁，是孙中山的父辈，孙中山对容闳心仪已久，可一直没有机会见面。1900年孙中山对日本横滨友人说：容闳是一位才智和经历

^①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馆藏，引自邓丽兰：《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孙中山英文藏档透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都很丰富的人物，如果反清革命胜利，“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当推容闳，他曾任驻美公使，在国内也颇孚人望。”^①同年9月2日，孙中山与容闳恰巧同乘“神户号”从上海赴日，与容闳同行的有容星桥（容开，容闳的侄子，兴中会会员，日本名平田晋），经容星桥介绍后，孙中山与容闳一见如故。抵长崎后，孙中山去旅店访容闳，容闳劝孙中山回国，在华南观察动静，以图再举。这次见面后，孙中山依容的劝告回国，并赴台湾观察华南局势的变化，并继续筹划惠州起义。容闳对孙中山的印象是：“其人宽广诚明，有大志”，他鼓励孙以“华盛顿、弗兰克林之志”为志。^②此后，容闳从长崎赴香港。1902年，洪全福、李纪堂等人计划在广州起义，拟推容闳为大总统。事泄后，容闳再度逃亡到美国。

在美国，容闳既与康梁为代表的改良派保持接触，也与孙中山革命派为代表的兴中会会员保持联系，但思想上已放弃改良主张，转向支持兴中会和后来同盟会的革命行动。他在美国四处奔波，继续为革命事业效劳，争取华侨对革命的支持和同情，并向美国人介绍孙中山。1909年，他邀请孙中山去美国，与荷马李和布斯等制定革命计划。后来，孙中山与荷马李等密谋的长堤计划，可以说是容闳促成的结果。

辛亥革命的成功，容闳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写信给他的老朋友谢纘泰，请他代向孙中山“致以衷心的祝贺”，并希望孙中山能“当选下届大总统”。容闳对新政府的财政问题十分关心，请美国朋友计算维持中国政府的正常运转需要多少经费，并把计算结果寄给孙中山。当时容闳患病在床，不能回国，他让儿子容覲槐回国，为民国建设事业服务。

孙中山收到容闳的信后，欣然邀请容回国辅政，他在1912年2月写信给容闳说：

……民国建设，在在需才。素仰盛名，播震寰宇，加以才智学识，达练过人，用敢备极欢迎，恳请先生归国，而在此中华民国创立一完全之政府，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倘俯允所请，则他日吾人得安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8页。

^②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5页。

享自由平等之幸福，悉自先生所赐矣。^①

然而，不幸终于发生，4月21日容闳去世，其未竟的心愿，终于由儿子来完成。小儿觐槐回国后，受孙中山、黄兴之托，到广东制造局任军火局长兼工程师。大儿觐彤回国后，担任矿冶工程师。1921年2月3日，孙中山签署“内务部委任令”，“任命容觐彤为本部技工”。^②

毫无疑问，容闳是个爱国者，正如美国牧师吐依曲尔于1878年4月10日在耶鲁法律学校肯特俱乐部的演说中所说：

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③

（二）致力于西医学传播的黄宽

黄宽则与容闳不同，他走上了学医、从医，医人救国的道路。他以其精湛的医术治愈了众多病人，解决了许多疑难杂症，成为近代中国留美、英归来的名西医，医治了许多贫病的同胞，获得中外人士的爱戴和欢迎。尤其是他致力于把西医学传入中国，成为近代中国医学史上有名望和贡献的人。

黄宽，字绰卿，号杰臣，广东香山东岸乡人。1829年出生，由于父母早亡，自幼跟随祖母一起生活，天赋敏慧，有“奇童”之称。11岁就读于澳门马礼逊学堂，成为该校的首期学生。据马礼逊教育会记载，黄宽于1840年入学，中文姓名叫亚宽，英文姓名 Afun。^④ 当他随鲍留云先生赴美时，已在马礼逊学堂学习了近6年之久，打下了英语基础，受到了西学的启蒙。

1850年夏，黄宽和容闳在美国孟松学校毕业。黄宽即去苏格兰，进入爱丁堡大学医学系。从马礼逊学堂到孟松学校，黄宽与容闳这对同窗十载的老乡、同学，这次分别，各自走上不同的救国道路。

①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44页。

② 邓丽兰：《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孙中山英文藏档透视》，第17页。

③ 容闳：《西学东渐记》，代跋，第15页。

④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2, p. 623.

爱丁堡大学是英国历史悠久的大学，该校的医学院颇负盛名，著名的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曾在该校医学院就读。美国一些青年也慕名远道而来在该校学习，美国一些著名医学院的教师都是爱丁堡大学的毕业生。黄宽在这所设备齐全、质量高且具影响力的大学攻读医科，是中国留学欧洲学习医科的第一人。经过5年的艰苦学习，毕业考试获第三名，获金牌奖和医学士头衔。1856—1857年，黄宽在英国的医院里实习两年，研究病理学和解剖学，获医学博士，成为华人留学外国领取医学博士证书的第一人。



黄宽

这时，爱丁堡大学出现一股“医学传教”热潮，并组织爱丁堡医学传道会，准备派传教医生往叙利亚、中国等亚洲国家，通过医术达到传教的目的。黄宽一方面受医学传教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希望回到祖国用学到的医术救治更多的中国同胞。1857年，黄宽以伦敦会传教医生身份返国，在香港伦敦会医院任职。他的身份使他在医务界拥有和西方传教医生同样的权益，可以开设私人诊所，收受病人。

回国后的黄宽通过在西医院行医，直接推进西医在华的传播。1858年，他到了广州，先在广州府学东街开办了一所医药局，悬壶治病，接着又接办英国人合信医生在广州金利埠创设的惠爱医局。合信主持的惠爱医局有50张病床，合信等人还一面编译西方医学著作，一面组织训练班，培养少数中国青年充任医生的助手。该医局因第二次鸦片战争而遭到破坏。黄宽接管后医局得到发展，医务蒸蒸日上。据1859年报告，该医局有病床80张，住院病人450人，门诊病人达26030人，黄宽还亲授生徒4人，助理诊务。^①1860年，黄宽因个人原因离开惠爱医局。

1862年，黄宽应李鸿章的邀请，赴天津任医官，但他对仕宦生活不感兴趣，半年后辞职回广州继续行医。洋务派丁日昌很器重他，劝他出任医官，走

^① 王吉民：《我国早期留学西洋习医者黄宽传略》，《中华医史杂志》，1954年第2号。

仕宦之途，他始终没有接受。^① 1863 年，中国海关医务处成立，内设海关医务官，其职责除负责海关职员的医疗保健外，主要承担对港口进出的船只进行检疫，当船上缺乏医生时，医务官还要照顾和治疗患病的船员。黄宽被聘为首批医务官，负责广州地区医事工作。在首任 17 名医务官中，唯有黄宽是华人。^② 可见，当时黄宽颇有名气，其医术不仅得到中国同胞的充分肯定，亦受到在华外国医生的认同和欢迎。

当黄宽接管广州惠爱医局的同时，他又在博济医院兼职，与美国传教医生嘉约翰合作，后来又在博济医院服务达十年之久。当嘉约翰因病离华，其院长一职由黄宽代理。黄宽在主持医院事务时，博济医院发展很快。医院所施手术次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他在医务上的地位愈显重要。黄宽医术精深，尤擅长外科，诊断精细。1860 年，他曾施行胚胎截开术（碎胎术），这是国内第一例手术。广东地区以患膀胱结石病人多，嘉约翰当时曾以作结石手术闻名，但在他之前，黄宽早已割治过 33 人。^③ 据统计，他做过 3 千多次膀胱结石手术。

除了主刀行医外，黄宽还积极致力于培养西医人才。他曾在自设的诊所内培养训练了 4 名中国学徒，中国人教授中国学生学习西医由此开始，西医在中国传播不再为外国传教医生和外国医生独掌。1866 年，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医学校，黄宽被聘为教员，担任解剖学、生理学和外科学课程，这些都是他在英国时主攻的科目，加上积累不少临床经验，他的教学很受欢迎。为了帮助学生直观地了解人体结构，黄宽还以尸体作解剖示教，使学生知识水平提高较快，医校学生不断增多。

黄宽醉心于临床诊治和教学，加上英年早逝，故无太多著述问世。1873 年，广州地区霍乱流行，他著文评论真假霍乱的区别。他兼任广东粤海关的医官时，每年要写一份详细的有关当地病情的报告，上交海关总税务司，集为《海关医报》（*Medical Reports of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出版。黄宽汇集的关于牛痘和霍乱发病情况的报告，颇受人们重视。他倾其全力于医疗事业，达

① 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上海书店 1984 年版，第 193 页。

② 马伯英、高晞、洪中立：《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文汇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46 页。

③ 《中华医史杂志》1954 年第 2 号。

到呕心沥血的程度，由于工作任务繁忙，救人如救己，久而久之，积劳成疾。1879年10月，黄宽患项疽病。正在这时，英国驻华领事夫人难产，求他出诊，家人再三劝阻，但他对家人说，如果他因病致死，只损一人，如果产妇难产，必定损失两命。最后他坚持出诊，孕妇产后平安，而黄宽归家后项疽病突发，于10月2日去世，享年49岁。

作为西医学最早的接受者和传播者，黄宽服务于中国医务界20年，终日沉浸在繁忙的诊疗、教学中，在医学领域里默默辛勤耕耘。他以精湛的医术、渊博的学识传遍远东，获得“好望角以东著名外科医生”的美称，深得中国人的爱戴和西方同行的称誉。他又是中国人在华传播西医学的第一人。正因为他是中国人，了解中国，他在传播西医学中贡献巨大。他的同学容闳准确地评价黄宽，他说：“以黄宽之才之学，遂成为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之良外科。继复寓粤，事业益盛，声誉益隆。旅粤西人欢迎黄宽，较之欢迎欧美医士有加，积资亦富，于1879年逝世。中西人士临吊者无不悼惜，盖其品行纯笃，富有热忱，故遗爱在人，不仅医术工也。”^① 曾与黄宽在医务上有密切合作关系的嘉约翰医生对黄宽的去世也感叹不已，他认为，黄宽称得上是中、英文化交流的一个象征，也是中、英人民之间友谊的榜样。

（三）提倡洋务事业的黄胜

黄胜（1827—1902），名达权，号平甫，胜，是其小名，广东香山县人。黄胜自美国归国后，从事过出版、翻译、教学等工作，在西学东渐中起过一定的作用。正如一位台湾学者所说，他“虽然始于翻译，也仅止于翻译，但由此可知他是愿意为中国的近代化尽一份心力的。”^②

黄胜世居澳门附近，1841年1月进入澳门马礼逊学堂就读。入学时15岁，中文姓名叫亚胜，英文姓名 Ashing。当时，该校已有学生5名：亚根、亚运、亚闳（即容闳）、亚杰、亚宽（即黄宽）。黄胜是赴美三位学生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到美一年后，得病不得不于1848年秋回国。虽然在美国时间较短，但一年多的美国生活和六年的马礼逊学堂学习，使他有了比较扎实的英语基础和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8页。

^② 苏精：《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台北上海印刷厂1985年，第266页。

一定程度的西方文化知识。



黄胜

美国孟松学校的校长海门是位大教育家，“德高望重，品学兼优”，擅长英国文学，尤其爱好莎士比亚的作品。他亲授英国文学，深受学生欢迎，他注意教学法，善于演讲，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他每日登堂授课，不仅讲文法的规则，还对词句之构造及精义所在，都解释得很详细。在他的教导下，学生们都阅读过许多英国文集。黄胜经过这样的训练，不仅增长更多的英国文学知识，而且也为日后从事翻译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黄胜回国后，在香港《中国日报》（The China Mail，又称德臣西报）从事印刷工作。该报主笔蓄德鲁特是他赴美的资助人之一，其人“慷慨明决，有当仁不让之风”。^①不久，黄胜在英华书院印刷所从事印书工作。英华书院是马礼逊在1818年创办，原设在马六甲，后迁往香港，该院的设立，“以交互教育中西文学，及传播基督教理为宗旨”。^②为配合传教和教学，该院的印刷所将《圣经》译为中文，广为印刷，也印一些沟通语言的工具书和中文典籍的英译本，在客观上起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黄胜对这份工作较为满意，虽然每月工资只有30元，他仍然安心工作，香港法院曾以每月120元的高薪聘他为翻译，都被他拒绝。

1858年，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在英商资助下，计划将中国儒家经典“四书”、“五经”译成英文，取名为《中国经典》。这是一个宏大的文化建设工程，翻译成功，将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在英华书院，黄胜一方面从事印刷出版业务，一方面帮助理雅各将“四书”译成英文。在王韬1862年来港之前，黄胜是理雅各翻译中国文化典籍的唯一助手。黄胜中文、英文皆通，帮助理雅各解决了许多困难，并校对出许多不应有的错误，是个得力的助手。在黄胜的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0页。

② 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第203页。

帮助下,“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翻译已完成,名为《中国经典》第1卷和第2卷,并于1861年开始出版问世。理雅各在高兴和激动之时,不忘向黄胜表示深深的谢意:“译者仅向其好友、教会印刷所主管黄胜君衷诚致谢,惟君之精通英语,始能称校核之职也。”^①

随着洋务事业的发展,清政府中办洋务的官员开始重视洋务人才。在黄胜的老同学黄宽的推荐下,当时的江苏巡抚李鸿章、江南制造局总办丁日昌,邀请黄胜前往上海协办洋务事业。黄胜一时不能前往,托王韬致函李鸿章和丁日昌,并把自己翻译的《火器略说》寄去,信中谈及该书是“译自西书,间参管见”,翻译枪炮制造这一内容是基于当时西人在中国翻译格致之书,包括天文、算术、舆地和医学等,“独于制器造炮一事未及一言”。^②王韬于1882年刊印《火器略说》时写道:“此书甫成,余即缮录真本上呈丰顺丁大中丞,中丞击节叹赏”。^③足见丁日昌对该翻译的赞誉。

不久,丁日昌升任为江苏布政使,后来又升为江苏巡抚。1869年,丁日昌再次邀黄胜到上海助其一臂之力,黄胜在上海只停留两个月即回香港。次年,丁日昌又邀他到上海,负责翻译西方地理书籍。黄胜再次托王韬代函,婉言谢绝。推辞的理由是他要还乡侍奉年迈的母亲,实际上还有重要的原因,即黄胜深知翻译西书并非易事,“选例必严,取材必富,摭言必雅,立体必纯”,非略懂语言文字就能胜任。他谦虚地表示,自己“才不足为世用,学不足为众式”,担心不能胜任。黄胜在上丁日昌书中,推荐了王韬,指出《火器略说》是两人合作的成果,王韬加以润色并发表意见。黄胜认为,王韬虽未能深究英文,但见识广,才思敏捷,能纵横议论,是个人才。丁日昌由此知道王韬,并加以重用。

黄胜从事过两年多的教学工作,为培养西学人才尽过力。1863年上海设立广方言馆,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被邀为英文教习,半年后由黄胜继任。黄胜从1864年8月至1867年初任广方言馆的英文教习。上海广方言馆是上海最早的外语学校。同文馆第一届学生张德彝曾记载1866年10月8日访问广方言馆的

① 陈学森:《黄胜——香港华人提倡洋务事业之先驱》,《崇基学报》,第3卷第2期。

② 王韬:《弢园尺牍》,光绪癸巳(1893年)沪北淞隐庐本,第7卷,第10页。

③ 王韬:《火器略说》,卷末,“再跋”。

情形，他说：“此馆系官设，又名贡西文馆，内分三馆。提调额设一员，姓叶名承铄字秋萍；汉教习额设三名；英文教习额设一名，姓黄名达权字平甫，系广东人，能英文，曾往来合众国六载。”^① 他的学生有政界、教育界的知名人物。如，最早一批学生之一的汪凤藻，1868年被选送京师同文馆，几年后任副教习，1891年至1894年为出使日本大臣，后任上海南洋公学校长。席淦，先在京师同文馆任算学副教习，1866年升任教习，任教近30年，成为继李善兰之后最有名的算学教习。严良勋在校时已和外交教习合译西书，他译的《四裔编年表》，以年表体例编辑各国帝王、总统年代，被时人认为是了解世界各国缔造、变革、种族、政教和战争的必读书。70年代，严良勋在广方言馆任教，后任福建知府。

出版事业是黄胜在西学东渐中贡献较大的一项工作。在人生旅途中，黄胜在印刷和出版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早在1853年8月，由马礼逊教育协会资助，英华书院印刷的《遐迩贯珍》创刊。^② 这是鸦片战争后在香港出版的第一份中文杂志。先后由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奚礼尔和理雅各担任主编，实际事务主要由中国学者黄胜负责，举凡中文撰稿、英文翻译、报馆总务，均由黄胜经理。^③ 该报为月刊，每期印刷3000份，每份售价为15文钱。1856年5月因主办人事务纷繁而停刊，共出33期。该报虽然只办了近3年时间，但它使中国近代报刊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重大变化。《遐迩贯珍》每期的新闻报道与评论占2/3以上的篇幅，成为我国近代第一个以时事政治为主的刊物。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宣传和介绍是该刊的另一重要内容，最后才是宗教。在刊物的装帧方面，以中国线装书的版式出现。该刊首先登载新闻图片，是近代中国新闻业之一贡献。

从19世纪50年代起，先在香港，后在广州、上海等地，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办的最早的一批报纸。其中，《香港中外新报》创刊于1858年，始为两日刊，后改日刊，篇幅很小，每天只出一小张，这是我国日报最早的一种。关于

① 张德彝：《航海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5页。

② 该刊的出版日期，黄瑚作过考证，创刊于1853年8月1日，每月1日出版，至1856年5月1日终刊。见黄瑚：《“遐迩贯珍”介绍》，钟紫主编：《香港报业春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3页。

③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页。

该刊创刊时的主编，一向认为是伍廷芳，也有说是黄胜。^① 当时黄胜 35 岁，已有相当出版印刷经验，完全有此可能。《香港中外新报》与香港《孖刺报》（Daily Press）有密切关系，因而有人认为它是英文《孖刺报》的中文版。其实，《香港中外新报》“名为《孖刺报》所有，实为华人单独主持，所有一切营业权利皆属华人”。^② 两者的关系是：《香港中外新报》“订借”了《孖刺报》用过的一套旧的中文铅字，^③ 它和《孖刺报》仅仅是“月纳印费”，自负盈亏的租赁关系。无论其主编是伍廷芳也好、黄胜也好，都是华人所办的我国第一份日报。

另一份有影响的中文日报——《香港华字日报》创刊于 1864 年。^④ 创办人是陈霭亭。初创时篇幅甚小，内容主要翻译西报和转载京报。该报向教会购得旧铅字一副，由创办人陈氏任主编，由英文《德臣报》社印刷发行。该报是香港影响较大的中文报纸。先后担任主笔的有黄胜、王韬、潘兰史、赖文山、林子虬等人。^⑤ 黄胜和他的朋友王韬积极为该报写稿。上海《申报》在介绍《香港华字日报》时，特别提到“其主笔为黄平甫及王君紫诠，飞毫濡墨，挥洒淋漓，据案伸笺，风流蕴藉，盖二君留心世事，博通中外之典章，肆力陈编，宏备古今之渊鉴，政刑措置，尽托闲谈，朝野见闻，总归直笔，不第供夫乾巽志夫虞初而已也。”^⑥

1871 年，英华书院因故停办，所属印刷所的设备全部变卖。印刷所的部分机器被清廷总理衙门购下，提供给京师同文馆作为印书之用，由黄胜亲自将机器押送到北京。余下大部分机器由黄胜和王韬联合买下，在香港设立一所专营印刷业的“中华印务总局”，并于 1873 年初开业。该局以最先进设备排印图书，他们承印的有王韬的《普法战纪》、湛约翰的《英粤字典》和邝其照的

① 前者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5 年版，第 73 页；后者见林友兰：《香港报业发展史》，台北世界书局 1977 年版，第 71—73 页。

②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 73—74 页。

③ 麦思源：《七十年来之香港报业》，《华字日报七十一周年纪念刊》。

④ 中国的报史学者一般认为该报创于 1864 年，但欧美部分报史研究家提出 1872 年创刊说，见《香港报业春秋》，第 30—36 页。

⑤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上册，第 60 页。

⑥ 《申报》1872 年 5 月 8 日。

《华英字典》等。^① 这些书在早期中外文化交流中起过重要作用。中华印书总局也在1874年1月5日又创刊《循环日报》，但由于黄胜在1873年5月前已离开香港，因而他没有参与《循环日报》的活动。

作为留学生的黄胜也曾协助容闳推进“留美教育计划”，为近代中国教育事业出过力。黄胜曾任留美幼童肄业局的委员，1873年6月12日率领第二批幼童30名赴美，与香港、上海7名自费留美学生同行。以后，黄胜一度回国，1877年初，受福建船政大臣丁日昌的委托，黄胜与唐廷枢（马礼逊学堂的同学）前往香港，招收公立学校的优秀学生40名，转入福州船政学堂的后学堂——英国学堂学习。由于这批香港学生成绩出色，以后船政局每年继续在香港招生。1878年黄胜第三次赴美，任清廷驻美使馆的翻译，但是，清政府驻美公使陈兰彬对他的印象不佳，1879年，出洋肄业局的帮办空缺，容闳提出让黄胜接任，陈兰彬认为黄胜“洋习太重，在局究不相宜”，改调他到金山总领事馆任翻译。国内又有人说他暗诱幼童入教，因而黄胜工作得很不愉快，不久他便回到香港。^②

在香港，黄胜的知名度很高。1858年任香港法院的第一位华人陪审员，1870年任东华医院的董事。1883年加入英国籍，次年被香港总督宝云提名为立法局的非官守议员，他是继伍廷芳后担任这一职务的第二位华人。1902年去世，享年77岁。

黄胜的一生，从事过出版、翻译和教学等工作，致力于西学传播和培养人才。虽然他没有容闳那样出名，但他从事的洋务事业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在早期的中外文化交流中有过贡献。他也因而被人称为“香港华人提倡洋务事业”和“近代中文报业的先驱”。

（四）兴办实业、倾心洋务的唐廷枢

唐廷枢（1832—1892）广东香山县唐家村（今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人。初名唐杰（入读马礼逊学堂时用此名），字建时，号景星，又号镜心。唐廷枢是实业兴邦第一人，近代中国的许多第一都与他的名字相连，比如中国第

^① 《中华印务总局告白》，《香港华字日报》，同治十二年五月初十（1873年6月4日）。

^② 苏精：《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第265页。

一家民族保险企业——仁济和保险公司；中国第一条国产铁路——唐胥铁路；中国第一家大型煤矿——开平矿务局；中国第一家水泥厂——唐山细棉土厂；中国第一台蒸汽汽车——“龙头”火车头；中国第一家医院——上海仁济医院。当他去世时，李鸿章在悼词中说：“中国可无李鸿章，但不可无唐廷枢。”上海《北华捷报》也报道，说：“他的死，对外国人和对中国人一样，都是一个持久的损失”。

唐廷枢是家中次子。父亲唐宝臣是个憨厚的农民，他在马礼逊学堂给校长鲍留云当听差。在这所洋学堂当差，让唐宝臣有了些见识。他意识到一个人如果懂得英语，又有文化，当然能找到好工作。一天，他向校长鲍留云提出：想签下8年的合约，用当听差的薪水抵学费，让两个儿子到马礼逊学堂读书。校长答应他的要求，于是，10岁的唐廷枢和15岁的哥哥唐廷植成了鲍留云的弟子。在六年的西式学堂的洗礼下，唐廷枢不仅学到一口流利的英语，懂得了西学，也兼学中学；经过学习，他的视野开阔多了，不仅了解中国，对外面的世界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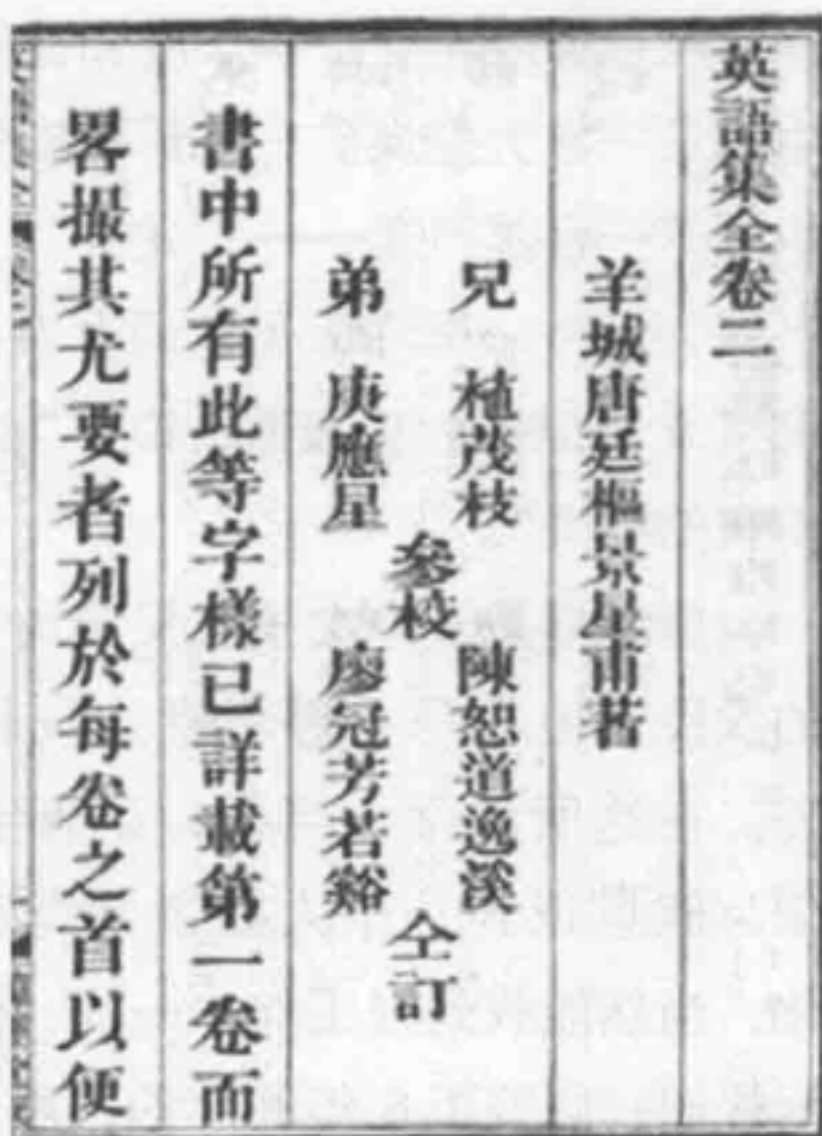


唐廷枢

在马礼逊学堂毕业后，唐廷枢没有和容闳赴美留学。1850年，该校停办后，他转入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理雅各在香港所办的英华学院继续学习。唐廷枢后来回忆自己称：虽受过彻底的英华教育，但没有继续到外国深造。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走上了给洋人打工谋生的路，凭借这些年的根基和勤奋，他在商界干得有声有色。由于他能写一手漂亮的英文字和讲一口流利纯正的英语，很快就找到工作。先是受雇于香港的一家拍卖行，后又受聘于香港政府巡理厅，担任了7年翻译。他的英语水平得到商行里的外国人称道，赞扬他“说起英语就像一个英国人”、“英文写得非常漂亮”、“英文是这样地精通”。1856年，唐廷枢被聘为香港大审院华人翻译。在香港政府任职期间，他还开办了两家当铺，开始踏足商界。

在打工期间，唐廷枢深感广东外贸发达，但懂得英语的商人不多。为了解

决华商和英语语系外的外商不懂英语的困扰，他决定编写一部实用的英语读本，这就是后来出版的他和他哥哥唐廷植共同编写的汉英词典《英语集全》。该书在广东经纬堂1862年出版，刊本上署羊城唐廷枢景星甫著，兄植茂枝、弟庚应星参校，陈恕道逸溪、廖冠芳若谿同订。《英译集全》卷首还特别说明：“这本书是一个隶籍广东的作者用广东方言书写的。它主要适应广东人和外国人来往、打交道的需要。”这是中国第一部汉英词典和英语教科书，该词典分为天文地理、日常生活、工商业、官制、国防、买办问答等6卷，并用粤语注音。唐廷枢在该书自序中写道：



《英语集全》

因睹诸友不通英语，吃亏者有之，受人欺瞒者有之；或因不晓英语，受人凌辱者有之，故复将此书校正，自思不足以济世，不过为洋务中人稍为方便耳。此书系仿照本国书式，分别以便查览，与别英语书不同，且不但华人可能学英语，即英人美人亦可学华语也。……贸易最大莫如英、美两国，而别国人到来亦无一不晓英语，是与外国人交易，总以英语通行。粤东通商百有余载，中国人与外国交易者，无如广东最多，是以此书系照广东省城字音较准。^①

《英语集全》出版后受到当时许多读者的赞美。张玉堂赞扬该书“分门别类，订谬指讹，莫不条分缕析，至吹唇音、卷舌音心为分，尤发前人所未发，诚为习英语者之津梁也。”吴湘在序言中赞扬唐廷枢苦心考究成就此书，“行见万里流传不胫而走，其利益于人者，岂仅属贸易一端哉？”^②可见，该书的

① 郭秀文等著：《清代广州与西洋文明》，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132页。

② 郭秀文等著：《清代广州与西洋文明》，第135页。

价值不仅有利于对外贸易者参考,对于一些有志于学习西学的青年才俊学习英语也是重要参考书。

在香港的时候,唐廷枢认识了李泰国。在李泰国的推荐下,唐廷枢于1858年到了上海担任3年海关关员,并被提升为总翻译。这时的唐廷枢已有了一定的资本,1861年,唐廷枢从上海海关辞职,出资创办了棉花行“修华号”,该棉花行的主要业务是收购中国国内的棉花再转售予怡和洋行,这是他首次踏足外贸生意。1863年,唐廷枢加入怡和洋行,成为怡和洋行的总买办,负责管理钱款、收购物资、开展航运、扩大市场等。在担任怡和洋行总买办期间,他开始尝试附股外国在华企业,先后附股的外国在华企业有华海轮船公司、公正轮船公司、北清轮船公司、美国琼记洋行的苏晏拿打号轮船、马立司洋行船队和美记洋行船队。

1863—1873年,唐廷枢在上海怡和洋行任职,继而成为总买办。这些经历,为他以后参与洋务活动能大显身手打下坚实的基础。郝延平先生对中国买办曾给予高度的评价。他指出:“作为中外商人的中介人,买办属于最早同西方人有直接而广泛接触的中国人,他们比任何别的阶层的人都更能看到从事新式企业的前途,并且有能力、有专长得以坚持下去。总之,买办在中国早期工业化中的重要性在于,他们成为一种集投资者和管理者的角色于一身的新型人物,因而成为开拓中国新式工业企业的领导力量之一。这种独一无二的两位一体的特征非常宝贵,因为这在当时其他阶层是很难得到的。”^①唐廷枢任怡和洋行经理时,“在取得情报和兜揽中国人的生意方面”,已享誉外国洋行,他不仅积累了经营洋行的经验和人脉关系,对西方近代企业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也了如指掌。这为他日后创办实业帮了大忙。

1873年7月,李鸿章特邀唐廷枢继任轮船招商局总办,主持全面工作;徐润、朱其昂、盛宣怀和朱其诏四人为会办,协同办理。轮船招商局是中国第一家官督商办企业。从1873年至1886年,唐廷枢的主要活动在轮船招商局,并担负起改组轮船招商局的重任。唐廷枢等人对企业的经营形式、组织管理等问题有切身的体会和深入的了解,他们意识到招商局要想壮大必须有制度保

^① [美] 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6页。

证。唐廷枢效仿西方股份制模式，在募股书上对资金使用、盈利、回报等项作了明确的规定，制定了《轮船招商章程》和《轮船招商局规》，为中国最早的民族企业创设了现代企业制度的雏形。新的《章程》和《局规》，加大对当地富商大贾投资的吸引力，确保华人占有局中的全部股权和产权。在唐廷枢进入轮船招商局的不长时间内，该局招股活动发生了根本变化。除了他和徐润大手笔认购股金外，上海商界、唐、徐的亲友、甚至香港的华商也纷纷入股。唐廷枢还把原来委托洋行经营的南浔、洞庭、永宁、满洲等四艘轮船，搭附局中的船队营运。这么一来，招商局大大增加了经济实力和航运能力，使该局逐渐摆脱困境、走出低谷。唐廷枢主持招商局后，招商局大有起色，转亏为赢。旗昌洋行经理谈唐色变，肯定“唐能把我们打得一败涂地”。^①

在整顿局务的同时，唐廷枢等招商局的高层人士还计划，在长江航线和北洋航线一展实力。如何增强和展示轮船招商局的实力？1877年3月1日，招商局以现银222万两收购美商旗昌轮船公司的全部资产。收购一事一直由唐廷枢主持，当时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楨说：其“事前之关说，事后之付款，实皆唐廷枢等主之也。”招商局以巨额兼并旗昌轮船公司这一重大事件，历来毁誉不一。有学者认为，全面衡量，应该属利大于弊：一是从外商手中直接收回了部分利权，并且减少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二是轮船由11艘增为27艘，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在与其他外国轮船公司的竞争中，较前可以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三是提高该局的声望，振奋国人的精神。^②收购旗昌的成功，表露出唐廷枢等人要与洋人一争高低的决心和勇气，也推动中国航运能力的提高，进一步打破外轮在中国内河和沿海航运上的垄断地位，形成招商局、太古、怡和三足鼎立之势。太古、怡和相互勾结，企图把招商局搞垮。于是，招商局坚持与两家公司进行谈判，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先后在1877年、1883年、1893年（唐廷枢已离开招商局）三次签订“齐价合同”。总之，唐廷枢在招商局的10多年中，把过去所积累的商战经验和所掌握的西方先进的管理方式，应用于招商局的经营，对于推动我国新式航运企业的发展，有效地抵制外国轮船公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① [美] 刘广京：《唐廷枢之买办时代》，《清华学报》1961年6月，第168页。

② 汤照连主编：《招商局与中国近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135页。

1878年6月的《上海远东月报》对唐廷枢的工作、经营之道以及成绩作一评论。文中写道：

（唐景星）兼当协和机器轮船公司、北清机器轮船公司、华海机器轮船公司之董事，此三公司幸得唐君之卓力而能成功者也。1873年奉直隶总督李公鸿章之命为中国轮船招商会总办，此缺现仍充当。伊乃一花翎二品衔福建候补道，如是可见其早年之机遇若何广大，深谋远虑而能善用也。破除旧时之痼习，采用新法集国人之资，用众人之功峰组织此协和、北清、华海三轮船公司，均以西法经营之，又得国人之信任，所见之明无可及也。伊为中国未经创见最大方略之领袖，又办招商局，得政府辅以巨资，不特广华人之事业，而其用行政皆本国之人，唯其中数部须专门技术为华人所未能者方始用西人管理。该公司虽纯用西法经理，尽为中国人之事业。唐君得国中最有权利，极高明之贵人李鸿章以为庇护之主，诚大幸也。此二公若能如余等所望得享永年，于国中之商务大有进步者也。现近之方略，唐君与有名者为才创办开平煤矿，亦纯用西法经理。唐君诚为明见远识之人，为余等从来所未遇见。伊初创一事，凡动一念，即能预知其结果，而竭力营谋之。今开平煤矿之发达是可操券而得也。我西人日与华人互相周旋，唯此君之广识博览实令人钦佩也。^①

由于唐廷枢对商务、办企业有方，1876年李鸿章派唐廷枢筹办开平煤矿。开平矿区在直隶（今河北）滦县开平镇西南。唐廷枢于1877年拟定官督商办章程，招商集股。1878年在直隶滦县开平镇正式成立“开平矿务局”，1881年全面投产，雇工3000人。开平煤矿是唐廷枢一生所经营的企业中历时最久的一个。这个煤矿从勘察矿址、拟定计划、招集资本到正式开采，都是在他亲自主持之下进行的。这个矿的年产量，在十九世纪的末期，曾经达到78万吨的高峰，为当时其他的官商煤矿所不及。^② 开平煤矿是中国第一个使用机器开采

①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第58—59页。

② 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的大型煤矿，中国第一个实行股份制经营的企业。唐廷枢在开平矿务局成功地应用了现代技术，使其“逐渐变成了一系列近代企业的中心”。^①为了使开平煤矿所生产的煤炭能够顺利运送，唐廷枢于1881年主持修筑中国第一条自建铁路——唐胥铁路。作为它的组成或附属部分，还有中国自营的第一家水泥厂——唐山细棉土厂。

在1875年至1886年期间，唐廷枢还创建、合并多间保险公司，从而获誉为“中国民族保险业之父”。入主招商局后，唐廷枢一直在思考招商局船舶和货物运输的保险问题。早在筹划招商局之时，李鸿章就设想华商自筹保险，招商局有了保险公司后，不仅可自保轮船，亦可兼保他船。当时中国的保险市场完全由外商掌控，1865年华商“德盛号”虽曾在上海开设了义和保险公司，但资本实力不够，不久便没了声息。而外商保险公司投保条件实在苛刻：一艘购置成本10万两白银的船舶外商只限保6万，超过部分只能自保，且保费按月“一分九扣”，也就是说年费率高达12%。此时的唐廷枢为了与外国保险公司争利，他着手“自筹保险”与外人抗衡。

经过和招商局高层商议，报经李鸿章批准，唐廷枢决定仿照招商局模式，集股招商，组建保险招商局，先在上海、镇江、九江、汉口、宁波、天津、烟台、营口、广州、福州、香港、厦门、汕头开展业务，进而在台北、淡水、鸡笼（基隆）、打狗（高雄）、新加坡、吕宋、西贡、长崎、神户、大阪、箱馆（北海道函馆）铺开。保险招商局的成立是保险业界一件大事，上海英国领事麦华陀在1875—1876商务年度报告中总结：去年保险业有两件大事值得注意，一是英国保险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中日水险公司退出市场；二是与招商局有隶属关系的华商保险公司成立，该公司的成立加大了市场供给，促使一些外国公司退出竞争。

1876年，44岁的唐廷枢与徐润等人集股25万两，开设仁和水险公司，试办一年，获利颇厚，继又添招25万，共股本50万两。“试办仁和水险公司，生意额旺，可得利三、四分。”^②但是，仁和保险公司只保水险不保火险，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878年，唐廷枢又与徐润等人集股50万两，续创济和水火

① [美] 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第175页。

② 汪敬虞：《唐廷枢研究》，第183页。

险公司。1886年,仁和、济和两公司合并,更名为仁济和保险有限公司,资本金达100万两。仁济和保险公司成为民族保险史上第一家颇具规模的保险公司。到了1893年,也就是唐廷枢去世后的第二年,招商局自保船险公积金已达118.6万两。

此外,唐廷枢也关心文化教育事业和公益事业,热衷于办学和培养中英两语交际人才。1874年他协同上海英领事麦华佗和傅兰雅等创办上海格致书院,并为“首创董事”。他也是在上海建立英华书馆的积极倡导者和捐资者。1874年容闳在上海发起创办《汇报》,唐廷枢是主要的赞助者。他在《汇报》发表了《论丝茶宜出洋自卖》的文章,认为“今火船往来中国者正多,获利亦巨,各国皆有轮船公司,在华人亦应会合公司,未造轮船运货出进,自取其利,毋庸附搭他国也。”^①唐廷枢还参与普育堂、医院等项社会事业的活动。上海医院中属仁济医院开设最早,设有中外董事,唐廷枢和徐润都是董事之一。此外,辅元堂、清节堂、仁济、元济堂、格致书院,唐与徐均为董事。

1892年10月7日,时任开平矿务局总办的唐廷枢于天津逝世。天津《捷报》在唐逝世第二天刊登醒目标题:“唐景星先生于昨天上午逝世,这使所有关心中国进步的人都感到哀悼。”上海报纸也刊出:“唐景星的一生,标志着中国历史的一个时代,他的死是一个持久的损失。”“要想找一个人来填补他的位置,那是不容易的。”唐廷枢逝世后,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曾手书挽联,亲往吊唁,驻天津外国领事馆为其降半旗致哀。上海轮船招商局特意从公积金中拨出白银1.5万两,作为对唐廷枢的特别抚恤,又从招商局船队中选出一艘最好的轮船,命名为“廷枢”号,以示对他的永久怀念。逝世后,其灵柩由招商局派专轮运回广东香山县唐家村安葬,有13个国家的商务官员随行护送。

从唐廷枢办洋务生涯可看出,他不仅投资于近代企业,支持洋务企业的建设;还能从国家和民族利权出发,学习西方先进的办企业理念和管理方法,致力于发展中国近代工商业,与外人争利,实现民富国强。《怡和洋行150周年特刊》对唐廷枢作了如下的评价:

^① 汪敬虞:《唐廷枢研究》,第181页。

唐景星的出色事迹，即使在任何国家，也够资格被称为一名现代勇敢的创业者。很清楚，他不仅在怡和开创他的事业，而且通过这个关系，在他所进行的有政府赞助的航运与采矿事业中继续得益，其中许多方案有助于中国的现代化。这一点，在唐挑起与西方企业及其产品作竞争的爱国事业之后，显得是更加正确。^①

^① 唐有淦：《从洋行买办到民族资本家》，珠海政协文史委员会、香洲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5年，第142—143页。